

◆ 邵盈午 著

憲猶劫

中國近代士階層研究

風林記曾題



中国 社会 出版社

◆ 邵盈午 著

憲猶劫

中國近代士階層研究

邵盈午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蕙荪劫——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 / 邵盈午 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4.9

ISBN 7-80146-720-5

I. 蕙… II. 邵… III. 文化史 - 研究文集 - 近代 - 人物
IV. G.03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7616 号

书 名: 蕙荪劫——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

著 者: 邵盈午

责任编辑: 张英杰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振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41 千字

印 数: 01-1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720-5/G.029

定 价: 28.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豪 侠

世乱天教重游侠	1
“任侠成风”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文化渊源	13
纵死犹教侠骨香	18
近代豪侠的人格特征	69
总结与评价	72

第二章 遗 老

何谓“遗老”	78
一时之义 古今通义	81
含谏吐忠	83
梁济的“死义”	97
王国维何以“自沉”	110
沈曾植的“不合时宜”	118
郑孝胥的“愚忠”	128
文化失范的惶恐	134
匪夷所思	141

并非结语的结语	143
---------------	-----

第三章 怪 杰

怪杰意味着什么	145
幽光狂慧	147
辜鸿铭的狂、怪、骂	156
章太炎的“特立独行”	176
刘师培的“激进”与“变节”	188
梁漱溟的“为王者师”	200
近世奇人有二黄	210
熊十力的“无所依傍”	220
怪杰的人格魅力与主体价值	232
假如人间没有怪杰	234

第四章 鸿 儒

两难困境：人世抑或出世	236
一点回溯：“士”之源流	237
康有为的“六经皆我”	239
梁启超的“善变”	249
晚清国粹派的口舌之功	257
寥落终怜吾道孤	261
“鹃血啼干”赋《落花》	280
文化自省：学术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	291
精英意识的失落	294
当今之“士”：价值何在？	297
后 记	302

第一章 豪 侠

世乱天教重游侠

近代以降，中华民族被迫踏上一片充满屈辱与痛苦的历史沼泽地；易言之，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动荡，并非历史本身独立发展、瓜熟蒂落的结果，而是由于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逼使中国在尖锐的中外民族冲突、文化冲突、社会冲突中走上一条“被近代化”的道路。以故，在当时的仁人志士心目中，“近代中国”，不啻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字眼；“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一向以刚毅雄强著称，可一旦落到现实感受的

层面,竟也发出如下的悲凄之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有感一首》

西方列强的鹰瞵虎视,大清王朝的颠预窳败,哀哀的喑类,惨淡的愁云,以及一个扼腕唏噓的热血豪侠所身受的巨大刺激,都浓缩在这四行小诗之中了。

就当时的整个民族而言,其意识形态普遍处于“屈辱——压抑——自尊”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正是在“压抑——自尊”的双重强力的撞压下,一批又一批高擎民族复兴火炬的爱国志士,慷慨于匹夫之责,义无反顾地将青春的生命投向御侮图强的时代激流之中。



1898年兴中会谢瓚泰所绘的《时局图》,形象地描述了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

人类或许就是这样,在屈辱中才渴望复仇,在挫折中才希冀自强,在软弱时才崇拜力量。于是,一个个胸怀奔流烈火、热血绝未凝固的仁人志士,被清季的窳败和西方列强的铁蹄所激扰,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古代的侠士,并以此激发勇气,砥砺斗志。柳亚

子的《满江红·题剑魂汉侠图》颇能体现这一时代的“典型情绪”——

荆匕良椎，叹底事，侠风消歇。蓦地里，逢君吴市，箫声激烈。壮士悲歌辽海曲，健儿醉踏沙场月。吊要离冢畔草边天，雄心切。 沼吴耻，几曾雪？报韩谊，终难灭！看不平棋局，唾壶击缺。青史百年薪胆恨，黄衫一剑恩仇血。问何时恢复旧中原，收京阙。^①

从诗人投掷姿态里涌现出的是一种生命的力度，激情的外射。这是倚天长剑的自傲，是侠骨峥嵘的期许。这一点，不惟柳亚子如此，在那个文恬武嬉、困蹇晦暗的风雨年代，不论是维新派人士，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不尚侠、颂侠；那些惩恶扬善、扶弱济贫、急难死义的豪侠人格，遂成为正义凛然、光明磊落的象征，成为近代知识者追慕不已的理想人物。一时间，尚侠之风，蔚为大观，并在社会上迅速流播开来。如维新派人士郑观应，有鉴于前人集唐五代侠义小说而成《剑侠传》，遂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搜辑剑侠故事，并倩人配图题为《续游侠传》，与原书合刊行世。作者在序言中揭橥出编辑此书的主旨：

余悯世宙之屯，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

几乎与此同时，谭嗣同在其所著的《仁学》一书中，对侠义精

^① 《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神亦备加推重,尝慨乎言之:

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

而梁启超对此亦有明睿的洞识;他有鉴于东瀛的崛起和中华的积弱,痛感“武德斫丧”之可悲,亟欲重振国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痛心疾首地指出:“二千年之腐气败习……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①

蒋百里在《军国民之教育》中亦痛苦万分地承认:“东方病夫国二,支那与土耳其是也。”严复则更是慨乎言之:“中国者,病夫也。”(《原强》)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东亚病夫”一词是西方殖民者强加给中国人的一个侮辱性称号,但事实证明,这种“病夫”意识,正深刻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代觉醒了的知识精英的忧愤和自省。作为一种强刺激,“病夫”意识导致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力”的发现。

“力”的发现,基本上从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对传统柔性文化的批判,在这方面,以梁启超的论述最为系统。他在《论尚武》中指出,“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成性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强悍之本性。”接下来,梁氏以犀利的笔锋,层层揭橥了中国沦为“病夫”的根由:“一由于国势之一统”。在大一统观念支配下,举国上下只醉心于四海升平,万国来朝,而尚武

^① 《新民说·论尚武》。

被视为“野蛮”的象征,于是,“其心渐弛,其气渐柔,其骨渐脆,其力渐弱”,从而使国民“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从第二个层面看,是“由于儒教之流失”。梁氏认为儒家倡导“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加之后世儒生袭用《老子》“雌柔无动之旨”,遂产生了以冒险为轻躁、以任侠为大戒、以忍耐为无上法门的柔弱人格。“三由于霸者之摧荡”。梁氏指出,历代开国君主定鼎之后,往往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硬的是“锄”术,即“一人为刚而万夫为柔,一人强而天下皆弱”;软的则是怀柔之术,即“柔之以律令制策,柔之以诗赋词章,柔之以帖括楷法,柔之以簿书期会,柔其材力,柔其筋骨,柔其言论,乃至柔其思想,柔其精神”,其结果必然是“人心死矣!”“四是习俗之濡染”。在这种柔性文化中,人们所醉心的是“学而优则仕”,而把军人视作“恶少无赖之代名词”和“不足齿之伧父”。

梁氏所谓的第一个层面,如果可用一个“破”字概括的话,那么,第二个层面则是“立”。最早吹响“鼓民力”之号角的,当首推严复。其后,梁启超又分别从“心力、胆力和体力”三个方面入手,展开了“力”的丰富内涵。他甚至借用佛教“三界惟心”的理论,论现象世界没有任何实在性,惟一真实的只是我心,外境皆为我心所造。“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既然“三界惟心”,那么“心”的力量就应当是无限的,至少是潜在地具备无限性。而当他处于激情状态或者是神秘的灵感附身的时候,“心力”就获得释放,移山填海的事业亦可成就:

而此心又有突如其来,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为我,无以名之,名之为“烟士披里纯”。“烟士披里纯”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而千万之英雄豪

杰、孝子烈妇、忠臣义士，以至热心之宗教家、美术家、探险家，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毕起于此一刹那顷，为此“烟士披里纯”之所鼓动。故此一刹那顷间不识不知之所成就，有远过于数十年矜心作意以为之者。^①



谭嗣同《仁学》初版本

在这里，梁启超显然把激情、灵感泛化了，泛化到一切伟大的创造性事业莫不源于此；同时也将此神化了，神化到“不识不知”、只发于“一刹那顷”的程度。由此可见梁氏本人所崇尚的那种“唯意志论”的英雄史观。在梁氏看来，只要有至诚的心力，坚强的意志，就可以获得创造的灵感，在激情的驱使下，推动文明史的发展；就可以成为创造人类历史的英雄豪杰。这样一种唯意志论的英雄史观，只能使他将历史发展寄托在少数杰出人物的意志和难以捉摸的“灵感”上，实际上透露出梁氏所代

表的改良派在过于亢奋的意向与实现意向的物质力量十分疲软之间的特殊心态。正是基于此，梁氏一再表现出对意志力量的

^①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高度推崇：“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①他期冀以此鼓舞世人纵身于时代的激流中，不计成败，报效宗国。作为一个爱国者，他本人也确有不计成败、径行独往的气概，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本人英雄史观中浓重的唯意志论的性质。

同样是唯意志是尚的谭嗣同，目睹传统价值解体、社会道德的沦丧，预言中国大劫将至。他认定这是人心多机械造成的。所以要用心力挽劫运，“先去乎自己机心，重发一慈悲之念……使心力骤增万万倍，天下之机心不难泯也”。^②“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③在《仁学》中，他更是开列出18种“力”，如“性久不变，如张弓然”的“永力”，“突然全变，如弛弓然”的“反力”，“互易不穷，如滑车然”的“转力”，“曲而能入，如螺丝然”的“锐力”，“往来飞疾，如鼓琴而弦颤然”的“速力”，“虽异争起，如风鼓浪”的“激力”，“骤起击压，无坚不摧”的“弹力”，此外，尚有“超力”、“决力”、“韧力”等等，此真可谓近代尚力思潮中的一个文化奇观。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青年鲁迅，不仅参加了以暗杀为主要手段的革命团体光复会，还以文字对“力”大加赞美。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将“诗力”视为一种审美化了的生命情感的力量。而在《文化偏至论》中，则把“意力”、“强力”视为一种生生不已、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冲动，青年鲁迅正是力图通过弘扬这种生命的“诗力”、“意力”、“强力”来扫荡中国那种强调“平和（中庸）”和老子“不撓”的弱化生命的柔性文化。鲁迅坚信：“二十世纪之新

①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②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7页。

③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8页。

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①

为了大力揄扬尚力尚武精神，近代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取瑟而歌。梁启超还煞费苦心地将“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编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借日本“武士道”之名，评说我国历史上的游侠。杨度序云：



青年鲁迅

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于外

则拒蒙古，胜中国，并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若吾中国之所谓武士道，则自汉以后即已气风歇灭，愈积愈懦，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数千年来霸者迭出，此起彼仆，人民之权利任其铲削，任其压制，而无丝毫抵抗之力；于外则五胡入而扰之，辽金入而扰之，蒙古、满州入而主我。一遇外敌，交锋即败。至今欧美各国，合而图我，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国民昧昧冥冥，知之者不敢呻吟，不知者莫知痛苦，柔弱脆懦，至于此极，比之日本，适为反对，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象之反如此，此其何故哉？

通过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之差异的比较，以图弘扬几乎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荡失的传统的游侠人格之精神，用意可谓至善！在该书自序的收梢处，梁启超深刻总结了豪侠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承嗣千年以来的侠义精神的法脉，将此视为振兴民族伟力之源：

闾里之有游侠，其武士道之末运乎！上焉既无尚武之政府以主持奖励之，中焉复无强有力之贤士大夫以左右调护之，而社会不平之事，且日接于耳目，于是乎乡曲豪举之雄，乃出而代其权。太史公曰：缓急者人之所时有也。夫生于专制政府之下，政治不修，法令不直，民之良懦者，其平居或往往不得衣食，委转沟壑。在上者既无道焉以振拔之矣，而法网严密，为陷于国中，或偶触犯，而非有意也，或并未触犯，而干侯之怨挟之，枉曲之吏从而罗之，则宛转无所控告，束身为鱼肉，以待命于刀俎已耳。于此时也，有人焉能急其难，致死而为之生之，则天下之归之如流水也亦宜，故游侠者，必其与现政府常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太史公曰：侠以武犯禁，侠之犯禁，势所必然也。顾犯之而天下归之者何也？其必所禁者有不嫌于天下之人心，而犯之者，乃大嫌于天下之人心也。

呜呼！我同胞，兴！兴！！兴！！！汝祖宗之神力，将式凭焉，以起汝于死人而肉汝白骨，而不然者，汝祖宗所造名誉之历史逮汝躬而斩也，其将何面目以相见于一九原。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署名“可权”的作者从王船山的《黄书·宰制篇》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中国边远地区民俗尚武“野蛮”的材料，以寻求中国士林文化几近绝迹的生命野性力量，以呼唤那些可以为“捍御之资”的“冒险进取”之士、“坚忍耐劳”之民、“猿接猱跳”之徒。

1906年,苏州商会体育会成立,该会以“尚武好侠”的“三吴古风”激励会员,同时亦深为“东晋六朝以后乃至文弱”而扼腕太息,并痛慨道:“数千年来,使我东南文物之邦,文治足以光史乘,而武略不足以壮湖山,则重文轻武之积习使然也。”^①

壮游在《国民新灵魂》中,公然反儒而倡“侠”,他对儒侠二者作了如下比较:

侠者儒之反,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重实际,儒者计利害而侠者忘利害,儒者蹈故常而侠者多创异”,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所以沦落到病夫状态,实乃“儒之罪哉!”而侠则“重然诺轻生死,一言不合拔剑而起,一发不中屠腹以谢”,以故,“国亡于儒而兴于侠,人死于儒而生于侠。

至于“幼慕独行”的著名任侠之士章太炎,更是大力倡导“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的侠士气概,将侠士精神视为真正的中国文化菁华,他迳直言道:“中国文化本无家舍弃者,但用之则有缓急耳。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②在章太炎看来,提倡游侠精神并非只是鼓吹种族革命的权宜之计,而是具有“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的特殊作用,具有“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的重要功能。基于这一观念,章氏竟推盗跖为“大侠师”,与伯夷“贞横虽异,本之一宗也”,“其主无政府一也”。在《建立宗教论》中,章太炎甚至将建立一种“依自不依他”的非人格神的宗教作为当务之急,他一再强调:“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

① 《“苏商体育会过去历史”序稿》,《苏州商团档案汇编》。

② 《答张季鸾问政书》。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于1905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为《民报》撰写了《发刊词》，将同盟会的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宣布《民报》之任务在于将三民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图为《民报》第一号

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屈退心；非举三轮清静，则不能去德色心。”由此可见，章氏已不再仅仅着眼于侠的“救人于危”的牺牲精神，而是注重自尊自贵，“依自不依他”，否定政府的绝对权威，这一主体取向无疑是与时代脉搏的跳动丝丝入扣的。

而作为太炎先生弟子的黄侃，在对侠的推重上，则比乃师更有过之无不及。1907年，他以“运甕”的笔名发表《释侠》一文，其时黄侃年甫22岁，正是血气方刚的英年，加之此时正师从章太炎先生治音韵训诂之学，故对“侠”字竟也匪夷所思地“解字”、“说文”如下——

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众矣，独取诸暗